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08

# 论《月光狂想曲》中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

李雨然,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当代犹太裔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以后记忆的手法再现大屠杀,不仅巧妙融合了史料、记忆与虚构想象,还融入了美国价值观和精神,呈现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特征。夏邦通过家庭后记忆书写,展现犹太苦难与救赎话语同美国英雄主义的紧密联系。在太空竞赛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将大屠杀事件内化为美国的联盟后记忆,另一方面积极反思美国的道德责任。然而,在尝试通过温情的文学想象以“面向未来”时,夏邦却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迎合美国文化多元性的需求,掩盖了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也暴露了后记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夏邦的《月光狂想曲》超越了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探讨,更多关注于大屠杀历史与美国价值观的结合与共鸣,为当代“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提供了案例。

**关键词:**《月光狂想曲》;迈克尔·夏邦;大屠杀叙事美国化;后记忆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3-0058-08

当代美国文坛活跃着众多第三代<sup>①</sup>犹太裔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 1963—)就是其中之一。其《月光狂想曲》(*Moonglow*, 2016)别具一格,在叙写大屠杀主题方面表现突出,体现后记忆<sup>②</sup>叙事特征。该小说采用虚构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我”的祖父——一位犹太裔美国老兵——在临终前回忆自己一生的故事。小说非线性地交织了20世纪美国重要历史事件,如二战、美苏冷战、太空竞赛等,将大屠杀植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语境之中。文学评论界普遍从大

屠杀的再现、犹太性、(后)后现代叙事策略和互文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例如,霍顿(Michael Holden)认为本书作为典型的当代后现代主义文本,深刻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生活的讽刺和矛盾<sup>③</sup>;巴勒斯特里诺(Alice Balestrino)指出,书中大屠杀叙事探讨了家庭作为记忆存储空间以及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角色<sup>④</sup>。近年来,国内学者如尚广辉和秦轩也开始关注夏邦的作品,分别从后现代叙事<sup>⑤</sup>和犹太“乌托邦”视角<sup>⑥</sup>分析《月光狂想曲》的创伤和文学想象等深层含义。然而,

收稿日期:2024-0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WW007)

作者简介:李雨然(1997—),女,江苏南京人,博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第一代大屠杀幸存者叙事和第二代父辈创伤叙事的渐趋淡出,第三代大屠杀叙事逐步成为美国犹太文学的主流。第三代犹太作家与大屠杀事件的直接关联虽不如前两代紧密,但大屠杀留下的民族创伤仍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作家在构建对大屠杀的理解时,往往依赖于“碎片化的参考资料、间接的故事、对话、观察,以及文献和抽象的‘历史’”。参见Aarons, V, Berger A. L. *Third-Generation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Trauma, History, and Memo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6.

②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指的是后代对前一代人创伤经历和记忆的间接体验及传承。她认为,犹太身份认同直接建立在大屠杀记忆或“后记忆”的基础上。后记忆具有传递性、集体影响性和再现性:它通过故事、影像、行为模式等形式传递给那些未直接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影响他们的身份和世界观的形成;同时,后代可能会通过艺术、文学、电影等方式来探索和表达这些被传承下来的记忆。参见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6.

③Holden, M. “From the Camps to the Space Race: The Holocaust and the Celestial Escapist in Michael Chabon’s *Moonglow*”,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20, 61(3): 288-299.

④Balestrino, A. “Radiant Darkness Leaked Out Through Her crack”,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Modernism*, 2018, 12 (Spring): 63-76.

⑤尚广辉:《大屠杀、战争、家庭:〈月光狂想曲〉的后现代创伤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1年第4期。

⑥秦轩:《“深层时间预期”与弥赛亚时间——“时间的架构”中夏邦的犹太历史重构及其民族标识》,《当代外国文学》2021年第3期。

笔者注意到,尽管评论者普遍遵循传统的犹太苦难和创伤叙事的批评脉络,或对战后美国政治体系进行反思和讽刺,但他们对小说所呈现的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倾向却鲜有提及。“大屠杀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这一概念自 1983 年首次出现以来,主要用于描述美国文化中大屠杀历史事件和记忆的处理、解释和传递方式。值得注意,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有意识地将大屠杀的历史和记忆与美国文化、社会历史及价值观相融合,以提高 21 世纪美国公众对此事件的认知和共鸣,在大屠杀的再现过程中展现“美国化”的叙事特征。

在一次访谈中,兼具美国人和犹太人双重身份的夏邦坦言:“我们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sup>①</sup>他谈及在该小说中如何书写大屠杀时,明确表示自己“非常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消费大屠杀……做法通常是以非直接的方式处理它,要么让它发生在幕后,或非直接地将它引入故事”<sup>②</sup>。实际上,作为第三代犹太裔美国作家的夏邦虽具犹太民族身份标志,但已融入美国社会。他对美国文化的深刻认同和依恋,使他在不引入美国主题的情况下表现大屠杀变得十分困难<sup>③</sup>。换言之,美国的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他在《月光狂想曲》中对大屠杀的再现方式。那么,小说在何种维度上呈现大屠杀的“美国化”趋势?自称“首先是美国人”的犹太作家夏邦如何处理大屠杀与美国政治的交横绸缪?后记忆理论与文本在追求“面向未来”的共同憧憬中是否迎合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后记忆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历史局限性?“美国化”趋势是否导致了大屠杀历史和严肃性的淡化?本文将借用后记忆理论,探究夏邦如何在《月光狂想曲》中呈现“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夏邦首先通过家庭后记忆的书写,展现犹太苦难与救赎话语与美国英雄主义的紧密联系。在太空竞赛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他进一步将大屠杀事件内化为美国的联盟后记忆,对美国

的道德责任做出了积极反思。然而他的想象后记忆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后记忆理论的意识形态缺陷,即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在尝试以温情的文学想象“面向未来”时,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迎合了美国多元文化的需求,暴露了其历史局限性。

## 一 家庭后记忆:苦难,救赎与美国英雄主义

赫希在后记忆理论中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指出“非言语和先于认知的传递活动通常在家庭空间中最为明显”<sup>④</sup>。她提出的家庭后记忆(familial postmemory)关注创伤经历在家族内的传递与影响,形成了一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身份认同模式,这种模式在家庭内部垂直传递。家庭故事是获取过往知识的最直接途径,“家庭语言可以作为易于理解的通用语言,跨越时空和差异,帮助实现认同和自我身份投射”<sup>⑤</sup>。因此,家庭后记忆强调灾难亲历者的后代通过家族成员的故事、影像和物件间接体验和继承先辈的创伤事件,从而形成对历史创伤的认知,并影响自身的身份构建。《月光狂想曲》中展示了这种家庭后记忆的传递机制。夏邦融合了回忆录的元素和家族传奇的叙事方式,以第三代犹太裔美国移民“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身为二战和大屠杀的见证者,主人公“我”的祖父所讲述的家庭历史与宏大历史(History)相异。夏邦通过书写祖父的记忆,重新解读宏观历史:“他将祖父的记忆转化为文本,聚焦于二战期间欧洲的解放和冷战太空竞赛等近期重大事件的微观影响,从而塑造出一种从历史的宏观场景中提炼的故事。”<sup>⑥</sup>祖父的每个人生阶段都见证了 20 世纪犹太苦难和美国历史的交织,并在晚年将这些经历倾诉于“我”,授权“我”记录下来“使之解释一切,赋予某种意义”<sup>⑦</sup>。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将家庭、群体和世代

①《迈克尔·夏邦:文学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我类型设限》,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52825014050.html,2018年4月28日。

②《迈克尔·夏邦:〈月光狂想曲〉是披着家族史外衣的小说》,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5214,2018年4月10日。

③Flanzbaum, H.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99, 1(1): 91-104.

④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4.

⑤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9.

⑥Balettrino, A. “Radiant Darkness Leaked Out Through Her Crack”,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Modernism*, 2018, 12 (Spring): 63-76.

⑦迈克尔·夏邦:《月光狂想曲》,孙璐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259 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的情感纽带联系起来”<sup>①</sup>,让下一代对犹太性深刻地感同身受,同时将包括大屠杀经历在内的犹太民族记忆置于美国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我”通过祖母的遗物和祖父的证词来了解大屠杀,借此方式使大屠杀的记忆在家庭范围内传递。

在书写作为犹太性表征的大屠杀记忆时,夏邦的家庭后记忆叙事融入了包括受害者话语和英雄主义在内的美国道德普适价值。林斌指出,“两个由美国媒体打造的大屠杀新人物类型——幸存者和拯救者——分别代表了‘受害者崇拜’(cult of victimhood)的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和扬善抑恶的‘美国梦’传统视角”<sup>②</sup>。夏邦笔下的祖父母形象恰好代表了这两种美国化的大屠杀新型人物画像。首先,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祖母传递的受害者话语通常以间接的媒介化方式呈现。与充当讲故事者角色的祖父不同,虽然祖母亲身经历大屠杀并长期与灾难创伤斗争,但在小说中祖母的大屠杀经历没有被她亲自叙述,而是依靠祖父的语言和“无皮马”“纸牌”等意象进行描述和再现。祖母的人物形象也是通过她的遗物以及“我”、“我”的母亲和祖父的回忆被塑造:母亲回忆祖母的一生是“历经艰险,逃难到美国,面对离国和丧亲之痛,并且要与她脑中的恶魔缠斗,竟然还能苦中作乐地活下去”;在“我”的印象中,失去是祖母人生的主旋律,“她人生中一个接一个的丧失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失去’才是她永恒的同伴”。由此可见,祖母及其代表的大屠杀事件变成了“二手资料”,被动地通过故事和图像以档案形式间接展现。在阿甘本看来,大屠杀是一个在双重意义上缺乏见证者的事件:一方面,无人能从死亡的内部作证;另一方面,从外部看来,“外人”被排除在事件之外<sup>③</sup>。因此,未经历过灾难的第三代作家夏邦在呈现大屠杀事件时表现出特别的谨慎。他将幸存者描绘为一个沉默的“他者”,以非直接的方式处理大屠杀,来重新解读和审思看似可靠的大屠杀历史。赫希指出,这种沉默“他者”的角色往往是女性,“母亲形象的缺失和

对其的幻想……是后现代审美和后记忆作品的典型范式”<sup>④</sup>。女性的经历和记忆在大屠杀历史的传承中被边缘化或忽视,她们的声音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喧哗中,幻化成苦难的缩影。实际上,在包括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的《鼠族》(*Maus*)在内的许多大屠杀后记忆作品中,沉默的女性受害者形象频繁出现。女性声音的缺失为大屠杀叙事创造了一个默声的情感背景。而已无幸存者的大屠杀事件,也逐渐演变成受苦和灾难的普适隐喻。

大屠杀的苦难话语需被发声,这使得具有英雄情结的救赎者形象,如夏邦笔下的祖父,显得尤为重要。在《月光狂想曲》中,祖父的救赎不仅展现弥赛亚式的犹太性,同时与美国的英雄主义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相结合。对祖父人物画像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始终渴望拯救他人,尤其是深陷大屠杀痛苦记忆的妻子。在初次见到祖母时,他便决定成为她的救赎者:“这个女人经历过巨大的劫难,虽然幸存下来,但精神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决定拯救她。”对战后生活感到失望的他向妻子承诺,“他会带她飞上月球,在那里找到避难所……那里的花园中种植着水培植物,他望着她剪下花朵,一切始终为宁静与平安的光环所笼罩”。美国式英雄主义情结与犹太救赎话语在祖父身上实现交汇融合。实际上,夏邦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美式犹太英雄的写作传统。如《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Cavalier & Clay*, 2019)中的两位主人公和《犹太警察工会》(*The Yiddish Policemen's Union*, 2018)中的兰兹曼,夏邦式的主人公具有救世主般的能力,他们愿意拥抱生存的黑暗混沌,将脆弱视为一种力量而非弱点<sup>⑤</sup>。祖父亦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优秀的士兵和工程师,身强力壮、性格坚忍,连“沉默寡言也被视为坚毅、沉稳和严谨的表现”。他的超人形象是天赋与坚韧的结合,他不断奉献和永不放弃的性格与美国文化中的超级英雄相一致。因而,祖父身上的犹太苦难和救赎话语与美国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相互呼应。由此可见,夏

①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1.

②林斌:《“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论犹太大屠杀的美国化现象》,《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

③Agamben, G.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 1999, p.35.

④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0.

⑤Dewey, J. *Understanding Michael Chab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4, p.6.

邦在家庭框架内的大屠杀后记忆书写,不仅媒介化地呈现了大屠杀创伤,还在表征犹太苦难和救赎话语的同时,内化了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美国特征和文化价值观。

## 二 联盟后记忆:大屠杀,太空竞赛与美国政治

家庭后记忆使犹太移民后代对大屠杀记忆产生共鸣,但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大屠杀与他们的家庭、种族、民族并无直接关联。为了唤起更多美国非犹太民众对大屠杀的认同感,并促使他们铭记与缅怀,夏邦积极地将大屠杀记忆与美国政治的宏大叙事嫁接起来。这一做法旨在使美国社会对本无“美国性”的大屠杀负起更多道德责任和社会政治意义,将其提升为美国国家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赫希将这种不同于家庭后记忆、在同代人之间进行的横向记忆传递机制定义为联盟后记忆(affiliative postmemory),它体现了“同代人间的联系以及同时代性的结果”<sup>①</sup>。在《月光狂想曲》中,个人和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形塑。夏邦构建的联盟后记忆将真实历史人物、美国秘密行动和阿波罗计划等放置于美苏太空竞赛的历史背景中,不仅暗示大屠杀与 20 世纪美国政治存在内在勾连,也似乎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美国间接参与了大屠杀,因此理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小说通过一个关键的历史人物——火箭专家韦纳·冯·布劳恩——将大屠杀同 20 世纪晚期美国太空竞赛联系起来。冯·布劳恩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标志性人物,被视为“现代航天之父”,在美国集体记忆中享有崇高地位。集体记忆指的是群体共享、传承的记忆和对过去的共同理解。通过电视、杂志等媒介,冯·布劳恩这位帅气、友善的火箭专家被视为“太空时代”激励人心的代

言人<sup>②</sup>。他在德国出生和成长,在二战期间建造了著名的 V-2 导弹,后来移居美国继续他的工作。阿波罗计划的成功使他的声望在美国达到顶峰。然而,在小说中,这位美国英雄却被揭示为曾是纳粹武装党卫队队长,其“道德问题在文本中反复出现,使夏邦的历史叙事更具有不确定性”<sup>③</sup>。随着故事的发展,祖父与冯·布劳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虚构的小人物与历史大人物之间的戏剧性碰撞。小说的题记引用了冯·布劳恩的一句话:“月球没有黑暗的一面。实际上,它都是黑暗的。”但事实上这句话出自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歌曲《月亮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充分展现了夏邦叙事的不可靠性<sup>④</sup>。夏邦通过这种不可靠叙事,意图挑战公众对其光辉形象的集体记忆,进一步管窥美国政策与大屠杀的勾连以及美国政府的“黑暗面”。

为了反抗集体记忆,夏邦在构建联盟后记忆时采用了反历史的叙事手法。祖父与冯·布劳恩的两次交集象征了祖父代表的反历史叙事对公众集体记忆的挑战。二战期间,虽然祖父作为美国士兵追捕这位德国火箭设计师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他作为狂热的火箭迷,找到对方的主要动力是“非常期待看到冯·布劳恩的火箭”,暗示了祖父最初对冯·布劳恩的崇拜和欣赏。然而,当他进入诺德豪森<sup>⑤</sup>、亲眼目睹残忍而非人道的场景时,这种热情戛然而止,他的认知崩塌了。紧接着,夏邦在脚注中明示了冯·布劳恩与诺德豪森之间的紧密联系:

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冯·布劳恩和美国政府一直对此事保密,对诺德豪森的往事也闭口不谈。1943 年 9 月后,冯·布劳恩曾多次造访孔斯坦山,并且

<sup>①</sup>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6.

<sup>②</sup>Biddle, W. *Dark Side of the Moon: Wernher von Brau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Space Ra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p.144.

<sup>③</sup>Francisco, CR. “Narratives of the Rocket: Chabon’s ‘Amnesiac’ Revisitation of Pynchon’s Posthuman Zone”,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20, 61(1): 91-103.

<sup>④</sup>Francisco, CR. “Narratives of the Rocket: Chabon’s ‘Amnesiac’ Revisitation of Pynchon’s Posthuman Zone”,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20, 61(1): 91-103.

<sup>⑤</sup>二战期间,诺德豪森是德国 V-2 火箭生产的主要地点之一。其中制造火箭的工人大多是集中营囚犯和俘虏,他们在诺德豪森遭受非人的折磨。据统计,仅在诺德豪森一地,就有约 6 万人劳累致死。参见 Jacobsen, A. *Operation Paperclip: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Brought Nazi Scientists to America*.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4, p.17.

亲自从囚犯中挑选出合适的技术工人(大多是法国人),以待日后将他们从布痕瓦尔德送至美泰尔沃克。见迈克尔·诺伊菲尔德的《冯·布劳恩:太空梦想家与战争工程师》(古典书局,2008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论文式的写作形式在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旨在营造可信度和客观性来说服读者接受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如果这一信息属实,冯·布劳恩将无法逃避对诺德豪森劳工虐待的道德谴责,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在祖父眼中,“这位德国工程师成了纳粹残余的真实化身”。祖父对冯·布劳恩抱有明显的鄙视态度,例如在书中划掉其名字,“用滑稽的德国腔念出冯·布劳恩的名字和引用他说过的话”,并拒绝出售由冯·布劳恩设计的火箭模型。尽管对登月非常关注,祖父却拒绝见证阿姆斯特朗实现他与冯·布劳恩共有的梦想,因为他认为“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

尽管夏邦在小说中对冯·布劳恩的批判声音不断,其真实的攻击目标是美国政府。他对冯·布劳恩的穷形尽相,暗示美国在大屠杀事件中看似旁观,实际上承担着道德责任。这一点可以从美国集体记忆对冯·布劳恩的态度变化中一探究竟。政府操控了公众对冯·布劳恩的舆论和道德判断,其形象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或被描绘为“美国英雄”,或被视为“德国纳粹”。这种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利益的影响。对于美国公众而言,这是一种“被操纵的记忆”<sup>①</sup>:被俘的冯·布劳恩移民美国后,不是作为囚犯,而是作为大红人受到美军的热烈欢迎,甚至被媒体描述为“爱好和平的平民和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的战士”;在他为NASA工作、设计象征美国力量的火箭并取得成就时,他一直隐瞒着自己希特勒时期的纳粹背景;当苏联首次将人送入太空,肯尼迪总统决定孤注一掷,抹去冯的过去,他成为了美国击败苏联的有利武器;在太空会议上,他因“为帮助人类奔向群星而作出重大贡献”获得年度土星奖章。虽然有声音质疑他的身份,但受美国媒体宣传影响的普通民众要么不关心,要么认为是苏联的抹黑。

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太空之路是由一个犯过错误的英雄铺就,而不愿“承认这条通往月球的天梯是由无数战争受害者的森森白骨垒成”。然而,冯·布劳恩去世后,他对美国“无用”了,人们开始反思他的道德正义、质疑他曾经在德国的身份:

在他临终前一年,福特政府曾经提出动议,授予沃纳·冯·布劳恩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这项动议差一点儿通过,但福特总统的高级顾问戴维·格根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抱歉我无法支持授予前纳粹分子自由勋章的提议,纳粹德国正是利用此人所研制的V-2火箭对许多座英国和比利时城市进行轰炸,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战后,他虽然对美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坦率地说,他已经得到了所能获得的最好报偿。”<sup>②</sup>

1985年,当CNN记者琳达·亨特(Linda Hunt)揭露了冯·布劳恩的过去后,他的名声急剧下降。他在德国的纳粹活动被认为“直接牵涉反人类罪”<sup>③</sup>。失去价值的冯·布劳恩被美国社会边缘化,被抛弃是其最后的结局:

最终冯·布劳恩还是以最经典的纳粹风格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研究生涯,无异于自杀,他是自己的梦想和成功的牺牲品。月球被抛弃了;阿波罗计划终结了。虽然多亏了冯·布劳恩不懈的痴迷,人类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登月之旅,但登月在公众眼中已经从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寻常的短途旅行,从国家使命变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即使在NASA内部,冯·布劳恩本人也和“土星五号”项目一起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被逐出大门。

冯·布劳恩浮士德般的命运既警示了非道德追求科技的危险,也揭露了看似光辉的美国梦与大屠杀事件的潜在关联。20世纪,美国政府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冯·布劳恩”,但对他们的利用与抛弃暗示了与这场罪行的共谋。夏邦在小说中将

①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页。

②安妮·雅各布森:《回形针行动:“二战”后期美国招揽纳粹科学家的绝密计划》,王祖宁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页。

③Neufeld, M. J. “Wernher von Braun, the SS, and Concentration Camp Labor: Questions of Moral, Political,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German Studies Review*, 2020, 25(1): 57-78.

家庭框架扩展到国家层面,通过叙事缩短了大屠杀与美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距离,指出“美国其实对这场发生在欧洲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sup>①</sup>。因此,在联盟后记忆层面,夏邦的大屠杀叙事将这一事件融入美国历史和国家记忆,使其成为历史的棱镜,体现他对宏大历史的反思和对当代政治的批判态度。

### 三 想象后记忆:面向慰藉和宽恕的未来

除了依托家庭记忆的纵向传承和集体记忆的横向传播,第三代大屠杀作家还通过想象来构建大屠杀后记忆。赫希指出,后记忆与过去的联系主要“不是通过回忆,而是通过想象力的投入、投射和创造来实现的”<sup>②</sup>。文学想象,作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继承祖辈记忆及创造自身后记忆的关键手段,不仅填补真相间的缝隙,而且具有未来的延伸性。为了实现后记忆的文学想象,夏邦采用伪时间顺序(pseudo-temporal order)的后现代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文本中的叙事时间突破真实时间的禁锢,强调时空的并置,模拟后记忆想象的片段性。

与记忆的发生机制相类似,故事中的时间没有绝对的起点。对读者来说,夏邦的情节安排增加了阅读的挑战性。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事件随机分布在不同章节中,随着叙事进展而并置。夏邦在小说中借“我”之口阐释了采用非线性叙事的原因:

我母亲很少回忆战争时代,很少提及她亲身经历的残酷,但只要回忆起来,她的主要感受就是愧疚。

“这样想让我觉得自己似乎不爱他们,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我也会想他们……甚至觉得他们的死和我有关,仿佛那是我的错,仿佛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是指我小时候,会影响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想起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里面就过去、逝者以及生者在当下生活中的救赎所作的长篇论述,读到这些时我没怎么在意,但我母亲大概对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这个话题深有感触。

在本雅明的观点中,过去和未来与“当下”的时间意识密切相关。他认为,“过去只能作为一种图像在可识别的瞬间闪现出来,之后便不再可见”<sup>③</sup>。因此,只有在特定的“当下”,才能认识到过去意识形态中隐藏的革命潜力。这使得“当下”在历史进程中显得格外突出,并包含着“穿插着弥赛亚时间的碎片”<sup>④</sup>。当下是行动和变革的关键时刻,它是历史现实与可能性的结合,具有救赎的意义,从而展现了面向未来的憧憬。如果《月光狂想曲》中的过去是待修复的时间碎片,那么夏邦突破时间限制的文学想象则填补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时间空隙,使其构建的大屠杀后记忆具有“面向未来”的特征。巧合的是,夏邦的文学想象与赫希提出的后记忆理论的终极目标——“向未来迈进”<sup>⑤</sup>——相呼应。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作为犹太裔美国移民后代的赫希和夏邦,所指的将来不单纯是犹太民族的未来。他们试图将大屠杀作为美国犹太民族的文化符号,融入美国“文化大熔炉”的价值观中,以丰富美国的民族多样性。处于美国文化和犹太民族性“中间位置”(in-between)的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寻找两者的平衡点。

夏邦在小说中的尝试是将乐观、希望和正义等积极元素融入这一历史黑暗时刻。历史灾难和个人创伤的受害者及其后代经常面临这样的伦理问题:能否宽恕加害者及其后代。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采用温情而含蓄的手法解读大屠杀,暗示宽恕和释然的可能性。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中认为,宽恕与遗忘相关,分为两种类型:“消极方面,它在于把反思和思辨的无力

①林斌:《“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论犹太大屠杀的美国化现象》,《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

②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

③Benjamin, W. *Selected Writings 1938-1940. Vol. 4*. Trans. Edmund Jephcott et al.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90.

④Benjamin, W. *Selected Writings 1938-1940. Vol. 4*. Trans. Edmund Jephcott et al. Ed.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97.

⑤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

放在不可补救的事之前,要加以放弃的东西的首位;积极方面,当遗忘的屏障又一次被向后推动些许的时候,让知识的这种放弃融入到愉快记忆的小小幸福中。”<sup>①</sup>这体现了宽恕可能是对遗忘的积极回应。夏邦将祖父的宽恕视为面对现实的解决方案和妥协。祖父选择相信一切都有积极面:“外公同样选择了相信——相信正义者的鲜血没有白流,仅凭星条旗——而不是纳粹旗——插上月球的土地这一点就意义重大。”为了像“锡安的哀悼者”一样追求内心平静,他在生命末期选择了妥协:“没有必要抱着昔日的仇怨不放,犹太民族毕竟活得比希特勒长,也活过了冯·布劳恩。”虽然他意识到祖母向他隐瞒了过去,但与消极宽恕不同,祖父选择通过积极的遗忘来拯救和保护他的家庭,珍藏关于妻子的“愉快记忆的小小幸福”:“但怀疑主义也是有限度的,那天下午,在利奥·梅德维德医生的办公室里,他选择继续相信,而非质疑我外婆对他讲述的战时经历。”出于爱,他选择了原谅与释然,并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试图保护妻子和继女免受这些黑暗真相的伤害,并要求孙子守护家庭的秘密:“外公不希望我把梅德维德医生的暗示告诉我母亲,他担心我母亲一旦知道我外婆说谎——无论谎言的性质如何——会很难原谅她。”

祖父选择了积极遗忘作为修通方式,那对灾难事件的后代来说,是否做出同样的选择?夏邦在小说结尾思考了这一问题:“死者能否被我们原谅?原谅的本质是一种情感还是交易?”或者说,活着的人能代表死者实现宽恕吗?他仍然借用文学想象的方式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并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我外公在临死的前一天就不再说话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是这样的:我问他在可可比奇之后是否还见过冯·布劳恩,他摇了摇头……

“没有,我再也没见过冯·布劳恩,”他说,“他几年后死了,我忘了死因是什么,总之很痛苦。我听说他疼得生不如死。”

我始终在等待他开口,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句话后面补充一句评论,比如“他是罪有应得”,或者“所以说,也许上帝的确存在”。

然而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躺在那里,长久地闭着眼睛,仿佛在痛苦的海面上艰难地划水,每划一下都更接近故事的结局——假如那位伟大的逃脱大师韦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男爵是正确的——接近始终等候在彼岸的那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如米勒所言,“文学成为见证的一种形式……它引导我们对记忆采取相关的行动”<sup>②</sup>。借助历史想象,夏邦在文学世界中探索宽恕的可能性,试图实现赫希所述的“朝向‘生命’而不是‘未来的死亡’”<sup>③</sup>。

然而,笔者认为,后记忆理论和夏邦的文学想象不谋而合的共鸣却揭示了两对两者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及其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后记忆理论倡导的“面向未来”的憧憬存在悖论:其通过想象的方式可能导致历史真相的虚构化和历史经验的模糊化。一旦缺乏历史的锚定点,那么理论本身会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随波逐流,有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夏邦通过文学想象填补历史空白,以温柔抒情和扣人心弦的笔触使大屠杀叙事感性化,引导读者关注小说的情感层面,而忽视深刻的历史反思。这种做法使犹太性逐渐被美国普适价值稀释,暗示美国犹太群体借用文学想象超越时间限制来寻求慰藉、“走向未来”。同时,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消费”大屠杀来丰富自身的民族多样性,将大屠杀普适化,不仅将其内化为美国犹太民族的身份标志,同时也演变成美国社会衡量善恶正义、道德秩序的准绳,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载体”<sup>④</sup>。这种“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虽增加了乐观展望,但削弱了对大屠杀严肃性的认识,并掩盖了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局限性。

①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3—674页。

②Miller, J. H.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Fiction before and after Auschwitz*.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xii.

③Hirsch, M.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6.

④林斌:《“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论犹太大屠杀的美国化现象》,《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

### 结语

迈克尔·夏邦在其《月光狂想曲》中展现了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特征。该小说通过后记忆书写,不仅为大屠杀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记忆、文化身份、文学表达以及政治寓意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询。在家庭层面,夏邦的叙事既表征犹太苦难和救赎话语,又内化美国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特征。在国家层面,他做出积极尝试,既缩短了大屠杀与美国政治之间的距离,又将其融入美国国家记忆,试图凸显美国对大屠杀承担的道德责任。然而,他只是通过历史想象用温情笔法诠释大屠杀,旨在探索慰藉和宽恕的可

能性以便实现后记忆理论企望的“面向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模糊了历史经验。这种文学想象也警醒我们需保持对理论的批判性距离,反思后记忆理论的局限性,即其中裹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灾难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远。《月光狂想曲》为新世纪的“美国化”大屠杀叙事提供了案例,暗示读者从双重视角把握大屠杀事件:一方面管窥历史灾难事件在当代美国文学中被接纳、解释和重构的过程;另一方面审思美国社会将其融入国家记忆以强化自身价值观和身份观的文化意图。

## Americanizing the Holocaust in Michael Chabon's *Moonglow*

LI Yuran & YANG Jinc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writer Michael Chabon portrays the Holocaust by way of post-memory writing in *Moonglow*. While skillfully blend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memories and fictional imagination, he incorporates American values and spirit, thereby revealing an “Americanized” narrative of the Holocaust. Through the writing of familial postmemory, Chabon closely links Jewish suffering and redemption narratives with American heroism. Against the political backdrop of the Space Race era, he internalizes the Holocaust as part of America’s affiliative postmemory while actively reflecting on America’s moral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in his attempt to use tender literary imagination to “move towards the future”, Chabon inadvertently diminishes the severity of the Holocaust, caters to the needs of American cultural diversity, obscures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values, as well as exposes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of postmemory theory. Going beyond discussing the Holocaust event itself, *Moonglow* focuses more on the integration and resonance of the Holocaust history with American values, providing a significant text characteristic of the “Americanized” narrative of the Holocaust.

**Key words:** *Moonglow*; Michael Chab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postmemory

(责任校对 葛丽萍)